概　说

俑是古代墓葬中陪葬用的偶人，属于明器的一种。

明器，又称“冥器”，是中国古代专为陪葬而制作的器物，包括模仿各种礼器、日用器皿、车船、家具、房屋模型以及偶人和动物模型等，质料以陶、木最为常见，还有瓷、石和金属制品。明器一词，周代即已使用。《礼记·檀弓》记载：“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当时将土做的小车和草扎的动物模型陪葬入墓圹，用以安慰死者之灵，名为明器。《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说：“及葬，言鸾车象人及窆，执斧之泣，遂入藏凶器。”郑玄注说：“凶器，明器。”由此可见，古代又称明器为凶器。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原始社会先民的墓葬中，已有专供死者随葬用的陶屋模型。商周时期，明器使用日趋普遍。由于明器在墓内专供死者之用，因此器形小而且不切实用，仅具模拟象征的意义。

关于俑的得名由来，东汉经学家郑玄在《礼记·檀弓》的注中解释为：“俑，偶人也，有面目机发，有似于生人。”《说文》：“偶，桐人也。”桐人即木俑。《越绝书》说：“桐不为器，但用为俑。”《说文》“俑”字下段玉裁注：“俑即偶之假借字。”另据《广韵》说：“木人送葬设关而能跳踊，故名之俑。”在考古发现中虽曾出土有能活动的木偶人，但未见过设有机关能够跳跃的俑，因此这一说法不一定正确。

说到偶人，就会使人联想起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君列传》中记载孟尝君的故事。战国时期，秦昭王听说齐国贵族孟尝君贤能，便派他的弟弟泾阳君到齐国作人质抵押，要求会见孟尝君。孟尝君将要去秦国，他门下食客劝他不要去秦国，孟尝君不听劝告。当时纵横家苏代对他说："今朝我从外面来，看见木偶和土偶互相交谈。木偶说：'天一下雨，你将要毁坏啦。'土偶说：'我从泥土里产生，毁坏了就回到泥土里去。如果天下雨，漂着你前进，还不知道归宿在哪儿呢。'当今秦国是如狼似虎的国家，而你想前去，倘若不能回来，你能不被土偶讪笑吗？"孟尝君才作罢。司马迁在这个故事里，用木俑比喻孟尝君，用陶俑比喻泾阳君。可见陶俑和木俑都可以称为偶人。

明器和俑的出现，是人类信仰的产物。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受灵魂不灭观念的支配，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是不会消灭的，幻想人死之后必将在另一个冥界地府里，过着和生前一样的生活。《荀子·礼论》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左传·哀公十五年》说："事死如事生，礼也。"因此，人们制作包括俑在内的各种明器埋入墓内，以满足死者冥世生活的需要。

从考古发现来看，俑的质料以陶、木质最为常见，也有石、瓷和铜、铁、铅等金属质地。为了区别不同的质地，人们往往根据俑的质料分别称为陶俑、木俑、石俑等。俑的形象，主要有侍仆、乐舞、士兵、仪仗及镇墓俑等，并常附有鞍马、牛车和家畜、家禽等模型。除了镇墓压胜的各种神物外，各类俑都真实地模拟当时的各种人物，因而可以根据俑的装束和动态特征，考见历代的社会生活习俗和典章制度，反映出各个时代的雕塑艺术水平。

俑作为陪葬明器，过去被视为不祥之物，致使历代出土数量虽多，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 20 世纪初期，陇海铁路施工时，在河南洛阳发现的唐墓中，出土了许多陶俑和三彩俑，不少古俑被运到北京厂甸的古玩店肆出售，于是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此后，中州古墓遭到大肆盗掘，不少古俑流散到国外。从 20 年代到 40 年

代,湖南长沙大量古墓又遭盗掘,出土了不少战国至西汉早期的木俑。40 年代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合作发掘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出土了一批东汉晚期的陶俑。1944—1945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敦煌附近发掘魏晋和唐代墓葬，出土一批彩绘陶俑。1948 年，华北人民政府派人收集曾被挖掘的北朝大族封氏墓群出土的重要文物，包括 167 件北朝陶俑。

建国以后，随着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开展，各地陆续出土各类俑群。其中较重要的有湖南长沙、河南信阳等地楚墓出土的战国木俑。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和四川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出土的陶俑。湖南长沙西晋墓出土的青瓷俑。陕西西安草厂坡北魏墓出土的陶仪仗俑。河南安阳隋张盛墓出土的白瓷俑。1956—1958 年,西安唐长安城郊发掘了隋李静训墓、唐独孤思贞墓、独孤思敬墓、杨氏墓、鲜于庭诲墓、杨思勖墓等 6 座墓葬,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彩绘陶俑、三彩俑和石雕武士俑。江苏江宁县牛首山南麓五代南唐李昇、李璟二陵的发掘,出土大批陶俑,包括模拟宫廷的内侍、宫官、宿卫、伶人、舞姬俑以及各种明器神煞俑。河南方城盐店宋墓出土的石俑以及山西侯马金墓出土的砖雕杂剧俑等。

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墓俑又有许多重要的新发现。其中重要的有陕西咸阳杨家湾村北汉高祖长陵两座陪冢的发掘，出土成批彩绘兵马俑，包括步兵俑、骑兵俑、舞乐杂役俑等共 2600 多件。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轪侯墓地出土一批彩绘木俑和着衣木俑。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末年墓出土近百件铜车马武士仪仗俑群。北朝俑有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河南洛阳北魏元邵墓、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山西寿阳北齐库狄回洛墓、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等出土的陶俑。唐俑有陕西乾县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陕西礼泉县昭陵陪葬墓郑仁泰墓

张士贵墓、阿史那忠墓、临川公主墓、李贞墓、安元寿墓等出土的大批彩绘陶俑和三彩俑群。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泥木绢衣俑。河南焦作金墓出土的陶俑。山东邹县明鲁王朱檀墓、四川成都明蜀王世子朱悦爟墓、河北阜城廖纪墓、上海潘氏墓等出土的木雕及陶质仪仗俑群。

70 年代中期，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是中国古代墓俑最重大的发现。它以磅礴的气势和细腻传神的雕塑，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三个兵马俑坑共埋藏步兵、弩兵、骑兵、车兵俑共 8000 余件，车马 500 余件，鞍马 100 余件及木质驷马战车 100 余乘，组成一个庞大的秦始皇帝的地下冥军。1980 年，在始皇陵封土西侧陪葬坑出土驷马铜车 2 乘，车上分别站立和跽坐御官俑。80 年代以后，陕西咸阳西汉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西安西汉宣帝杜陵以及少数汉代达官显贵墓中，都出土有一种原穿戴有不同衣著的裸体陶俑。其中 1991 年起开始发掘的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已出土彩绘裸体陶俑 3000 余件以及木俑、木车马等，这是继秦兵马俑后又一重大的考古发现。还在长安城西北部发掘了专门烧制裸俑的窑址，出土了裸体陶俑和俑头共 800 余件。汉代诸侯王墓俑有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陶兵马俑，包括将军俑、兵士俑、陶马及驷马战车共 2000 余件。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彩绘陶俑。北朝墓重要的有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磁县湾漳北朝墓及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等出土的陶俑。隋唐时代俑重要的有山西太原隋斛律彻墓、河南洛阳唐安菩墓、孟津唐岑平等墓、偃师唐李嗣本墓、李延祯墓、柳凯墓等出土的彩绘陶俑和三彩俑，四川万县唐冉仁才墓出土的青瓷俑。宋元时代俑重要的有江西波阳、南丰、临川、德兴和安徽望江等地宋墓出土的瓷俑，四川广汉宋墓出土的陶俑，福建福州南宋墓出土的寿山石俑，陕西户县元代贺仁杰墓出土的陶俑等。

第一章　俑的起源与演变

第一节　俑的起源

中国古代商周奴隶制时代，在丧葬习俗上流行“以生人为殉”的葬俗。据《墨子》一书记载：“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商周王室贵族陵墓的考古发掘，证实了文献记载关于人殉制度的真实性。当时王室贵族大墓中，都要杀戮大量的奴隶和牲畜作为陪葬，少则数十人，多达数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卫兵及专供杀殉用的“人牲”，并有马、狗等牲畜以及陪葬的车马坑。据不完全的统计，现已发现的河南安阳殷墟人殉、人牲总数约在 5000 件以上。

商周时期这种残酷的人殉制度，遭到了当时不少人的反对。春秋晚期墨子及其门徒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主张革除厚葬习俗，大力倡导“节葬”。孔子则主张用刍灵陪葬，反对人殉和用俑随葬。《礼记·檀弓》记载：“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孟子·梁惠王》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檀弓》郑注说：“刍灵，束茅为人、马。”即用草扎缚的人和动物模型。从上述文献记载，说明至迟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俑已经作为墓中的随葬品了，所以孔子才会发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叹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那么,孔子所说的‘始作俑者’究竟出现在什么时代?据现有的考古资料,1937 年河南安阳殷商晚期的王室墓葬中,曾出土 3 件小型陶俑,头部盘发,双臂反缚,脖子上带有枷锁,下躯捆绑,模拟奴隶的形象。这 3 件陶奴隶俑尽管出现在人殉盛行的商代晚期墓中,但与后世所称‘俑’的概念完全符合,可以看作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陶俑。因此,俑的产生可以追溯到 3000 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从俑的开始出现到以俑葬代替人殉,其间经历了长达千余年之久。

关于俑的功用,最初仅仅作为用偶人来模拟为死者陪葬的奴隶,即可以看作是人殉的替代,以供奴隶主贵族在冥世继续役使。至于将俑作为镇墓避邪压胜之物以及作为墓主人地位等级和权力的象征,则是俑在发展过程中所衍生出的功用,以致使古俑又增添了鬼谲神秘的色彩。

第二节 春秋战国俑

公元前 5 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社会的崩溃和封建社会的兴起,在丧葬习俗上,出现了以俑葬逐渐取代人殉的葬俗。战国时代,厚葬之风盛行。《墨子·节葬》说:“棺椁必重,葬埋必厚,文衾必多,衣绣必繁,丘垄必巨。……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于圹,又必多屋幕,鼎鼓几梃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在这种厚葬之风影响下,使当时明器墓俑的制作日趋兴盛。《韩非子·显学》有‘象人百万’的记载,所谓‘象人”,即用土、木等材料制作的俑,可见战国后期明器墓俑制作之盛。

根据考古资料,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墓俑,大多象征乐舞和侍仆类的奴婢,少数象征近卫武士。北方的周、韩、魏、齐、秦诸国以及南方的楚、越、巴蜀等国,都曾出土有陶、木、铜质的俑,呈现出不同的地方特色。

北方诸国主要流行小型陶俑，见于齐国和三晋地区。齐国俑先后在山东平度、临淄、泰安、长岛、章丘等地齐墓中发现，其中临淄郎家庄发现一座春秋、战国之际的齐墓中，陶俑和殉人同出于一墓中，主室周围陪葬坑内有殉葬的幸臣或妾婢，并陪葬有成组的小型陶俑，包括舞女俑、骑俑和武士俑，舞女俑长裙上原有红、黄、褐、黑等色彩绘条纹。章丘女郎山战国齐墓出土的彩绘陶乐舞俑，由歌唱俑、舞俑、奏乐俑、观赏俑等组成一组乐舞场面。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韩墓出土的乐舞俑和侍婢俑，形式多样，或舞或拱，或抱或负，造型朴拙，仅具轮廓。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晚期魏国墓内也出土有陶俑。据《西京杂记》记载，战国魏襄王墓在西汉时曾被广川王刘去疾掘开，墓内发现有佩装的石武士俑及捧持物品的石女侍俑。地处关中的陕西铜川枣庙村秦国墓内，则出土有拱手侍立的泥质彩塑侍卫俑和侍仆俑。

南方的楚国盛行随葬木俑。在湖南长沙、湖北江陵、河南信阳等地楚墓，出土数量较多的战国木俑，有男女侍俑、舞乐俑、武士俑及镇墓兽等。人俑大多俑体扁平，用单块木头雕刻而成，或用榫卯拼接手臂。姿态有的侍立，有的跪坐，有的作舞蹈状。俑身有的施彩绘，有的身上绘有珠、璜、彩结和彩环组成的成组玉佩，有的着衣木俑身着绢衣，上绣凤鸟花卉纹样。楚人“信鬼好祀”，所以战国楚墓中常见头插鹿角、口吐长舌的木雕髹漆镇墓兽，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色。在长江下游一带的战国中晚期的楚墓中，出土一种中空的红陶俑头和俑手，随葬时原配以木质俑身，并着有绢衣。这种独特方法制作的侍仆俑，反映出江南地区楚俑的特点。与楚毗邻的西南地区巴蜀民族，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墓内也随葬木俑。四川青川战国巴蜀墓内出土有彩绘木侍俑。

战国时期，南方越人和西北边陲的人都铸造青铜俑随葬。浙江绍兴战国越墓出土的一组铜乐俑和新疆伊犁新源县出土的铜武士俑，反映出各自的民族风貌。

第三节　秦汉俑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代在明器墓俑制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史记·秦始皇帝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徙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秦始皇从全国各地征调大批匠师和刑徒集中郦山，制作成批大型陶兵马俑群。

秦始皇兵马俑埋葬在陕西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从葬的兵马俑坑内，四个兵马俑坑中，除四号坑为未建成即废弃的空坑外，其余一、二、三号坑共有各类兵士俑近 8000 个，陶马 600 余匹，驷马战车 100 多乘以及大量的实用兵器。兵马俑按照秦代的军阵编组排列。一号兵马俑坑由步兵、弩兵和战车组合排列的 40 路纵队组成的长方形军阵，除位于边沿担负侧翼与后卫的弩兵分别面朝南、北、西方外，其余 38 路步兵俑及战车一律面朝东方，象征秦都咸阳禁卫军的右军。二号兵马俑坑由步兵、骑兵、车兵和战车组成的曲尺形军阵。根据地下建筑结构和陶兵马俑的排列，大致可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一是由立式和跪式弩兵俑组成的小方阵；二是由甲士俑和驷马战车组成的方阵；三是由战车和随车步兵、车兵、骑兵俑混合编列的长方阵；四是由战车和鞍马骑兵俑组成的长方形轻骑兵阵。这座俑坑象征禁卫军的左军。三号兵马俑坑平面呈凹字形，武士俑环绕周壁面内相向排列，包括手执铜殳的仪卫和车上有圆形华盖的驷马乘车，这座俑坑应是象征郎中令统领的宫廷侍从——郎卫。整个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规模宏伟，布局严密，再现了秦国“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壮丽图景。

秦兵马俑是模拟秦代军队的象征物。包括将军俑、步兵俑、弩兵俑、骑兵俑、车兵俑以及陶马、驷马战车等，兵马俑形体与真人真马大小相等，兵士俑身披铠甲或着战袍，并施加彩绘，有的士兵手

执实用的青铜兵器。秦始皇兵马俑的制作，运用写实的艺术手法，细部刻画入微，形神兼备，成功地塑造出性格鲜明的秦代将士形象。

在秦始皇陵园周围，除了从葬的兵马俑坑外，还发现有车马坑和马厩坑。车马坑在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两乘装饰华丽的铜车马都是驷马车，1号车上站立一御官俑，2号车为安车，御官俑跽坐于前舆，这两乘铜车马象征秦始皇东巡时的御乘。马厩坑位于始皇陵园东边偏南处的上焦村，坑内出土大型跽坐的陶俑，作端坐姿态，同出的随葬陶器上刻划有‘左厩’‘中厩’‘宫厩’‘三厩’等陶文，坑内并殉葬有马，可见这些殉马坑象征宫廷马厩，而坑内随葬的跽坐俑则是模拟掌管马厩或饲马、驯马的圉人俑。

秦代南方受战国时期楚文化的影响，墓内随葬木雕侍仆俑。河南泌阳和湖北云梦等地秦墓木俑有的作拱手侍立状，有的双手持物，俑体表面施以红、黑彩绘。

汉代盛行厚葬之风。东汉王充《论衡》说‘谓死如生’，即将死者当作生人一样看待，正如西汉桓宽《盐铁论》一书所说‘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致使以俑随葬的风气更为普遍。汉代少府属官中有东园匠，据《汉书·百官志》记载‘东园匠令丞，主作陵内器物。’《后汉书》也说‘东园武士执明器’。东园匠专门为皇室贵戚制作丧葬用品，诸如棺椁、玉衣及明器墓俑之类，称为‘东园秘器’，每年所费达数千万。西汉都城长安城西北部还设置专门烧制陶俑的官窑群。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当时重要将领及受封的诸侯王死后，也要使用大批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的显赫地位及权力。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初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墓南的11个陪葬坑中，居中为战车坑，左右两列为兵马俑坑。共出土陶兵马俑近3000个，包括步兵俑、骑兵俑和乐舞杂役俑，步兵俑和骑兵俑分别集中排列，成方阵。陶俑造型较秦兵马俑小，兵、马都经彩绘。这批兵马俑的

时代大约相当于西汉文帝时期。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兵马俑坑出土的步兵俑、骑兵俑和驷马战车共 2300 余件,分别埋藏于 4 座兵马俑坑中，估计原藏兵马俑总数约 4000 个,作 4 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兵士俑有立姿和坐姿两种，俑身战袍外彩绘铠甲。这批兵马俑群是西汉前期分封在彭城（今徐州）的某代楚王墓中陪葬的兵马俑群。

西汉时期墓葬中，随葬侍仆俑较为普遍。有衣着艳丽的宫廷侍女形象，有袖手侍立的家内奴仆俑，有持戟直立的谒者俑，也有双手前伸的御车俑。陕西西安任家坡汉文帝窦皇后陵从葬坑的长方形陶棺内出土彩绘女侍俑，或坐或立，体态端庄，模拟宫廷侍女形象。从汉景帝末年开始，西汉都城长安地区新出现一种裸体陶俑。在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以及属于武帝初年的“利成”墓中,都曾出土有裸体陶俑,原按有木臂,俑身上加着帛衣，有的俑体上还留有丝织衣服的残痕或小铜带钩。这类着衣裸体俑，即西汉宣帝时桓宽在《盐铁论》中所说的‘桐人衣纨绨”是受楚俑风格影响的产物。

南方原楚国疆域内仍沿袭楚国的习俗，随葬木俑。在湖南长沙，湖北江陵、云梦等地的西汉前期墓中出土大量木俑，其中长沙马王堆西汉轪侯家族墓出土着衣俑和彩绘俑两大类，有着衣女侍俑和彩绘立俑等。云梦大坟头汉初墓中出土的女侍俑身上，用红、黑漆绘衣服及花纹。江陵凤凰山西汉墓还随葬有木片刻凿并加漆绘的侍仆俑。据长沙马王堆和江陵凤凰山的汉初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遣策文字记载，汉墓中出土的家内侍仆俑以及生产劳作俑，都是象征当时的奴婢而被随葬入墓内。

西汉前期的劳作俑，在南方汉墓中常有发现。如湖南长沙马王堆轪侯利苍之子墓和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木俑，有手持锄、臿等农具的耕作俑。在长沙西汉晚期墓中，仍出土有手持臿、耜、镰刀的耕作俑，据汉墓中出土的遣策记载，这类劳作俑是作为

农业奴隶的模拟物。

除了兵马俑、侍仆俑和劳作俑外，歌舞乐伎俑也是西汉时期常见的题材。长沙马王堆轪侯家族墓出土着衣歌舞俑和彩绘乐俑，彩绘乐俑一组 5 件，正在吹竽和鼓瑟。北方汉墓出土的陶女舞俑有的俯首折腰,有的长袖拂肩,舞步轻盈,富有动感。山东济南无影山西汉墓出土的乐舞杂技陶俑群，由 22 个舞俑、乐俑、杂技俑和观赏俑组成,整组陶俑布局严谨,姿态各异,以情节性的群塑形式,表现了观赏乐舞杂技表演的热烈欢快气氛。

自西汉晚期以后,厚葬之风更盛。墓葬中出现仓、灶、井、磨、猪圈、楼阁、碓房、田地等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各种陶质模型明器,以及猪、狗、羊、鸡、鸭等家畜和家禽的偶像。贵族墓中还采用木制或陶制或铜制的车马模型随葬。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抨击这种厚葬现象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杰,生不极养,死乃崇葬,或至刻金镂玉,梓梓楩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潜。”

随着东汉时期封建庄园经济的发展，劳作俑的数量比西汉时期明显增加。如反映农业劳作的持臿农夫俑、水田劳作俑、踏碓俑等，有的劳作俑同其活动环境联在一起，再现了东汉时期农业劳动的真实情景。此外还有反映家内劳作的厨炊俑、刀俎俑。到了东汉晚期，在四川出现了一手持臿、一手持箕而腰佩大刀的部曲俑，使原来单纯的农夫俑演变为亦兵亦农的部曲俑。

东汉时期的墓俑，已不见西汉前期模拟当时步骑和车兵形象的兵马俑,而出现一些武卫兵士俑。在河南、陕西等地东汉中、晚期墓中出土的陶楼阁模型上,常见一种戴盔披甲的武士手持弩机弯弓欲射和骑马警卫的武士俑。这类武士俑应是当时强宗豪族私家武装的模拟物。甘肃武威雷台的一座东汉末年墓中，出土一批铜车马武士仪仗俑，其中有手执钺、戟的铜骑武士俑，这类手执兵器的骑俑，仅仅是作为象征墓主人地位和权力的仪仗俑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乐舞杂技百戏俑也是东汉俑中常见的题材。河南洛阳的东汉墓中出土有成组的模拟乐舞百戏的小型陶俑群，有吹奏乐舞俑，有舞姿生动的七盘舞俑，有精彩纷呈的倒立杂技俑。河南灵宝张湾东汉墓出土一组俳优俑，置于陶楼底层门前。四川出土的抚琴俑形象生动，尤其是成都与郫县等地出土的击鼓说唱俑，将汉代民间说唱艺人滑稽诙谐的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甘肃武威磨嘴子和河南灵宝张湾东汉墓出土的木质和陶质六博俑，以生动的神态刻画，表现出汉代博戏的真实场面。

汉代墓葬中出土镇墓俑较少，在广东、四川等地受楚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出土一种执蛇长舌的镇墓俑，亦有人首兽身、张口吐舌的镇墓兽。西北地区东汉墓中则流行一种形似獬豸的独角镇墓兽，或作牛形硕身的独角镇墓兽。

在汉代的墓葬明器中，和俑同时随葬的有各种动物模型，如骑俑中的马，出行仪仗中的马车或牛车等。陕西兴平茂陵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模拟汉代宫廷御马的形象。广西贵县风流岭西汉墓出土的张口嘶鸣的大铜马和驭手俑，形象生动。东汉时期四川巴蜀地区形体高大的陶马以及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奔马，雄浑矫健，富有生命活力。此外，河南辉县东汉墓出土的昂首翘尾、张口吠叫的陶犬和南阳东汉墓出土的釉陶卧犬，富有生活情趣，是东汉动物造型艺术的精品。

第四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俑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公元 3世纪前期，魏、蜀、吴三国分立，经西晋至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当时统治者屡次申令严禁厚葬，致使明器墓俑的制作受到较大影响。

三国时期，各国墓葬随葬俑的种类和数量较以前明显减少。中

原及北方地区曹魏墓仍然流行陶俑，一般仅随葬男女侍仆俑，双手捧钵或弯曲于腹前,并有少量的狗、鸡、鸭等家畜、家禽模型。长江中下游的东吴墓俑除陶俑外，还有青瓷俑和木俑。俑的种类主要有侍仆俑和镇墓俑两类。侍仆俑有的拱手侍立，也有头部顶罐侍仆俑,并常见前额带有类似‘白毫相’的裸身托掌跪坐俑。镇墓俑有人面兽身镇墓兽，头生双角、张口吐舌的镇墓俑，还有身躯扁椭圆形的鳞鲤，即俗称穿山甲。少数东吴墓内有骑马武士俑、陶牛车以及马、羊、狗、猪、鸡、鸭等动物模型。地处西南的蜀汉墓出土有陶男女侍仆俑和牛、狗、鸡等动物模型。

西晋取代曹魏以后，中原地区西晋墓内随葬陶俑已形成固定的基本组合,即包括镇墓俑、侍仆俑、牛车和鞍马以及庖厨明器、动物模型等几组明器墓俑。镇墓俑包括牛形镇墓兽和身着盔甲、一手持盾一手执兵器的武士俑两种。侍仆俑一般有男仆女侍各一件，作拱手端立状。牛车和鞍马象征墓主人生前出行乘坐的交通工具。庖厨明器有灶、井、磨、碓等模型明器,还有猪、狗、鸡等家畜家禽模型。南方长沙西晋墓内出现青瓷俑，俑群大体可分为两组：一组模拟墓主人出行的车马仪仗俑，包括牛车和鞍辔齐备的乘马以及一组高冠执板的骑吏、手持刀、盾的武士、骑马鼓吹的乐队,并随从有戴尖帽，手持刀、盾的赤足步兵俑。另一组象征墓主人在官署或家中的属吏和侍仆俑，有作为属吏的执简对书的文吏俑，有手持各种什物和跪坐执炊的侍仆俑。这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青瓷俑群，是当时贵族官僚和世家大族拥有众多属吏和部曲家兵的真实写照。

公元 4 世纪前期，西晋覆亡，东晋政权偏安江左，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乘机进入中原,五胡交争,政权不断更迭,形成十六国纷争的复杂局面。由于社会动荡，以致丧葬制度混乱。东北地区的后燕和北燕墓内部不随葬俑群。关中地区的陕西西安草厂坡前、后秦墓出土庞大的仪仗俑群，包括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的武装仪卫俑，骑马鼓吹俑，身佩弓矢、披甲执锐的步兵俑以及人马都披铠

甲的甲骑具装俑，还有站立或抬物的男女侍仆俑和弹琴、拍手高歌的女乐俑,并随葬有灶、井等庖厨明器以及猪、狗、鸡等动物模型。这批陶俑群模拟墓主人生前宏大的出行场面和家居享乐的生活，反映出十六国时期浓厚的战争气氛和统治者以兵力多少来象征权力地位的历史特点。甘肃武威前凉墓内随葬用松木削制成的男女侍仆俑，形象呆板。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十六国晚期墓内，出土木武士俑，男女侍仆俑以及牛车、木马等。西南地区四川成都发现的成汉墓,随葬有陶文吏俑,侍仆俑和击鼓、吹箫乐俑,部分陶俑身上施朱、黑色彩绘。

公元 4 世纪后期，鲜卑拓跋族统一了北方地区，建立了北魏。北魏前期墓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山西大同北魏墓中都有发现。基本内容承袭自西晋俑群，即包括镇墓俑、牛车和鞍马、侍仆俑以及庖厨明器、动物模型。俑群中的甲骑具装俑，则承袭自十六国时期的陶俑。俑群保留较多的鲜卑习俗，如陶俑的面相具有胡人的特征，俑体服饰也反映出鲜卑服饰的特点。但在俑的制作上又受到汉族文化、习俗的影响。这一时期还新出现了负物的驴和骆驼模型。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以后，改革鲜卑旧俗，礼仪制度日趋严密，丧葬制度包括随葬俑群融合发展成为新的规范,随葬陶俑的组合可以分为三组：一、镇墓俑,包括一对分别为人面和兽面蹲坐状的镇墓兽，两个形体高大的按盾甲胄武士俑；二、仪仗俑,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包括骑马鼓吹俑、甲骑具装俑、文吏俑、步兵俑、击鼓俑以及随行负物的驴和骆驼模型等；三、侍仆俑，有男女侍仆俑、胡俑、劳作女仆俑和乐舞俑等。北魏都城洛阳以外地区虽然受到俑群组合的影响，但关中和山东地区的北魏墓俑在俑群种类和制作造型上，都保留有各自的地方特色。

北朝晚期自公元 6 世纪前期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至公元 6 世纪中叶，东、西魏又先后为北齐和北周所取代。东魏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北齐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中心。东魏、北

齐俑群在河北磁县和山西太原附近出土成批的俑群，陶俑组合仍沿袭北魏俑群的组合内容，俑的种类与造型与北魏时稍有变化。镇墓兽头顶上各伸出一支朝天的戟，镇墓武士俑由北魏的裲裆铠改着明光铠，手按长循表面饰一狮面图案。仪仗俑中出现数量众多的风帽套衣俑。女侍俑数量也明显增多，有手持各种器皿、用具或衣物靴鞋的女侍俑，舞乐俑中出现长须飘拂的胡人舞蹈俑。此外，还出土有灶、井、仓、厕等模型明器和牛、羊、猪、狗、鸡等家畜家禽模型，动物多雌雄成对出现。这一时期随葬墓俑数量急剧增多，河北磁县湾漳北齐大墓出土陶俑竟达 1500 余件，其中一对文吏俑通高 142.5 厘米，神情端肃，为罕见的大型陶俑。山东临淄北齐墓中出土有匍匐跪拜俑和双头蛇体相连的“墓龙”。

西魏、北周墓葬在陕西咸阳和宁夏固原等地有少量发现。随葬俑群也是继承了北魏俑群组合内容，但陶俑造型与东魏、北齐陶俑有较大的差异，镇墓兽作钱负责同志匍匐于地状，镇墓武士俑不持盾，身躯稍作歪曲状。仪仗俑中胡俑数量较多。北周陶俑的制作工艺远逊于北齐俑群。

南方东晋南朝墓俑，沿袭西晋的传统习俗，随葬墓俑数量较少，一般只有男女侍仆俑各一件，都城南京地区除男女侍仆俑外，常见随葬一种陶犀牛形镇墓兽。少数大墓内出土模拟墓主人生前仪仗侍卫的持盾武士俑。南京象山发现的南迁江左的豪门氏族王氏墓群中，出土了一组以牛车为中心的陶俑群，牛车前有驭车俑，牛车西侧有一匹鞍辔齐备的陶马和牵马俑，车前马后有或跪或立的侍仆俑。南京附近南朝墓主要随葬陶男女侍仆俑和犀牛形镇墓兽，少数墓有陶牛车和驭车俑。江苏丹阳胡桥、建山南朝大墓有石雕文臣俑、武士俑和女侍俑。湖北武昌南朝墓出土有双手拱于胸前的陶侍仆俑、胡俑，还有马、牛等动物模型。广西桂林、恭城和融安等地发现的南朝齐、梁墓中，出土一种滑石男女侍仆俑，略具人形，刀法简练，形象拙稚。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随葬一组外出仪仗俑

群,包括瓷骑马俑、肩舆俑、扛旗俑、侍仆俑以及陶武士俑、击鼓俑等，反映出浓厚的地方特色。

第五节　隋唐五代俑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达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墓俑制作的繁荣时期。

隋代祚短,俑的制作处于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隋代统一全国后,开始创制新的礼仪制度,在明器墓俑制度方面,主要受北齐和北周的影响。《隋书·礼仪志》记载隋代丧葬等级,规定三品以上、四品至七品、八品以下至庶人三个明显的等级界限。品官墓中随葬大批俑群,包括镇墓俑、以牛车为中心的仪仗俑以及侍仆俑,仪仗俑中仍保留有文武骑俑和甲骑具装俑。都城大兴附近隋初俑群中同时保留有北周和北齐风格的造型，豫西隋墓陶俑明显地承袭着北周俑群的特征,而豫北隋墓陶俑则沿袭着北齐俑群的特征。到公元 7 世纪初隋代大业年间,逐渐创造出隋俑自己的造型风格,如身着甲胄的镇墓武士俑,胸前开始出现纵束的甲绊,女侍俑已一改北朝晚期略显臃肿的体型，塑造出细颈削肩、广袖长裙的造型特征。南方隋墓所出俑群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陶俑的服饰与北方中原地区基本一致。但南方隋俑除陶俑外,还出土了制作精细的青瓷俑,两湖地区隋墓中常见陶质或瓷质的十二生肖俑,两湖、安徽、江苏等地隋墓中还出土有一对人面鸟身俑，这些墓俑都不见于同一时代的北方隋墓中。此外,南方隋墓中陶制仓、灶、井、磨等庖厨明器和家畜家禽模型普遍增多。

唐代近三百年时间内,明器墓俑在北朝、隋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据文献记载,唐王朝在少府监下设甄官署,专门负责制造宗室陵墓所需要的明器墓俑。唐代墓志铭中屡见“赐东园秘器”,即指甄官署所属官窑烧制的产品。至于身份地位较低的人,随

葬俑群则属民窑的产品。民间凶肆上都有明器墓俑出售。据唐人小说《李娃传》记载,长安城内东、西肆凶器铺在朱雀大街互相比较明器墓俑的优劣，围观者竟达数万人。可见凶肆明器墓俑种类数量之多。

根据考古资料,唐俑的发展与演变,大致可分为初唐、盛唐、晚唐三个时期。

初唐时期，在长安和洛阳两京地区已经出现厚葬之风。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指出:"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车而冥器穷金玉之饰。"从考古发现来看,两京地区的俑大致可分为镇墓俑、仪仗俑、侍仆俑以及庖厨明器、动物模型四类。唐代镇墓俑,据《大唐六典》、《大唐开元礼》和《通典》的记载,唐代明器中有四神,即当圹、当野、祖明、地轴,其中当圹、当野为两个按盾直立的武士俑，祖明、地轴有人认为是一对人面、兽面镇墓兽。仪仗俑仍以牛车为中心，牛车周围有头戴风帽、小冠或幞头的各种立俑和骑俑，北朝至隋代流行的甲骑具装俑逐渐消失，保留下来的是骑吏俑、音声俑以及牵马、牵驼俑。侍仆俑中常见体态清瘦、长裙曳地的女侍俑，还有女舞俑、伎乐俑或劳作俑。庖厨明器有灶、井、磨、碓等,动物模型有牛、羊、猪、狗、鸡、鸭等。俑群以彩绘陶俑最为常见，也有素陶俑和釉陶俑。个别如淮安靖王李寿墓内随葬有彩绘贴金甲马俑。西安发现的贞观年间入葬的左卫将军独孤开远墓随葬陶俑达 146 件。

两京地区以外的山西太原、长治地区和辽宁朝阳地区，出土有双头人首蛇身的墓龙、人首鱼身或兽首鱼身的仪鱼以及仰观俑、伏听俑。长江中游唐墓中流行镇墓兽、人面鸟、双翼兽、武士俑和男侍俑。四川万县初唐墓随葬青瓷俑群，包括由甲骑具装俑、骑马乐俑、文吏俑和牵马牵驼俑组成的仪仗俑，男女侍仆俑、女伎乐、镇墓铠甲武士俑、十二生肖俑、人首鸟身俑以及马、骆驼、牛、鸡、鸭等动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